

# 以後殖民觀點論翻譯行為 —— 一場以翻譯為名的殖民與對話

吳肇祈\*

## 摘要

在關於後殖民主義的眾多論述中，翻譯經常被提出並指為殖民者用以對被殖民者的一種強行附加、改造文化的工具；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翻譯本身或許便可看作是一場存在著殖民行動，並保有後殖民性的殖民論述，即「將依附在源語文化下的源語文本 (source text) 以翻譯行為將之轉換為依附譯語文化存在的譯語文本 (target text)」。本研究係從後殖民主義觀點出發，試探討翻譯行為本身，並以相關後殖民主義翻譯研究論述為理論建構基礎。

根據薩依德 (Edward. W. Said) 提出的「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與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對於文化翻譯的「第三空間」 (The Third Space) 的提出，以及文化翻譯理論 (cultural translation) 的翻譯觀，試

---

\* 現職：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論依附譯語文化之下的譯語文本，與「殖民者—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可否對等而論？

本研究將以此窺探整體翻譯行爲，主要描述在翻譯行動中，源語與譯語文本及文化間的相對應關係，並探討譯語文本在譯語文化中生存的可能性。最後提出譯者在這場以翻譯爲名的殖民論述中應採取何種姿態來看待、處理兩造間關係。

關鍵詞：後殖民、文化翻譯、東方主義、第三空間

吳肇祈

### **Abstract**

In many postcolonial discourses, translation is often brought up and referred to as a tool of the colonist by which the culture of the colonized is forcibly transformed. From another aspect, translation also could be seen as an action with colonization as well as characteristics of post colonization; that is, translators translate the source text (which depends on the source culture) into the target text (which depends on the target culture). This study, based on related postcolonialism translation theories, aims to discuss translation it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ism.

According to “Orientalism” proposed by Edward W. Said and “The Third Space” in cultural translation addressed by Homi Bhabha, together with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rget text which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arget culture and “colonizers — the colonized.”

This study inquires a translation action, mainly describing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he target text as well as their cultures and explores the target text's existence possibilities in the target culture. Finally, it provides translators some advices on treating and dealing with it in the name of translation as a colonial action.

English keywords: Postcolonialism, Cultural Translation, Orientalism, The Third Space.

## 壹、前言

在關於後殖民主義 (Postcolonialism) 的眾多論述中，翻譯經常被提出並指爲殖民者用以對被殖民者的一種強行附加、改造文化的工具，由其是翻譯中的「異化」與「歸化」翻譯策略，直接被指稱爲將殖民者的文化思維以引介或強輸的方式進入被殖民文化中的一項利器，強化了霸權視角，甚至幫助了「西方 / 殖民者」再現「東方 / 被殖民者」。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翻譯本身或許便可看作是一場存在著殖民行動，並保有後殖民性的殖民論述。如果說後殖民性是一種獨立與依附相互纏繞、並存的一種過度狀態，存在了薩依德 (Said, 1935~2003) 指出的「可怕的從屬性」(Dreadful Secondariness)，由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從屬性」關係，致使被殖民者無法完全從政治、經濟、文化中獨立出來。此一從屬關連自某層面看來，也同樣存在於譯語文本 (由源語文本轉換而來) 與譯語文化之間，即「譯語文本須依附譯語文化存在，並且無法完全從中獨立出來」。

因此本研究參照後殖民理論中薩依德提出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 以及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1949~) 對於文化翻譯觀點所指出的「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 作爲基礎理論，並參照翻譯理論中的文化翻譯論，借三方觀點來討論翻譯行爲，試圖探究以下論題：

- 一、翻譯是否可算作是一場殖民行動？即「將依原附在源語文化下的源語文本以翻譯行爲將之轉換爲依附譯語文化存在的譯語文

- 本」。
- 二、若上述論點成立，那麼翻譯行動產生的（來自源語文本的）譯語文本是否存在後殖民的情境殘留？
  - 三、霍米巴巴提出了第三空間的看法，即「在此空間中，『殖民者/源語文本』的權威不再是顯而易見，而是被置入一個文化翻譯空間」，這與「翻譯作為殖民行動」的論點是否出現了對立？
  - 四、譯者在上述殖民論述中應以何種策略與方式看待或翻譯源語文本？

## 貳、文化翻譯

心理學家維果茨基 (Lev Semyonovich, 1896~1934) 認為，思維與語言是一種過程，是從思維到語言、語言到思維的一種連續往返，並且思維是透過語言產生意義的。(李維譯，1999：130-136) 文化翻譯的產生，某部分即建立在「詞語包含思維與語言的混合 (Amalgam)」觀點之上。不可否認地，思維與語言均自文化而來，因此在翻譯時不能僅專注語言層面，忽略其後乘載的文化意涵，此即開展了文化翻譯的討論空間。

文化翻譯包括兩種不同意涵：(1) 文化的翻譯 (Cultural Translation) (2) 對「文化」的翻譯 (Translation of Culture)，「二者都涉及對既定『文化』界線與疆域的協商，這不僅包括了狹義的文字翻譯，更包括了概念、思想、制度與文化意識的翻譯。」(張君玫，2012：119) 由此可見，翻譯行為非僅一場單純僵直的文化移植，同時也是文化的創生，是曾經發生過並持續發生的文化生成過程，它解構並重建源語

文化、譯語文化整體化概念間的差異，因此翻譯必須不斷跨越既定疆界。翻譯不單是單詞間的互換與轉移，乃須對源語文化中的意義物件進行拆解、消融、解構、雜揉、轉造與重組。(張君玫，2012：37-38)

因此翻譯中的文化信息呈現，應適應譯語文化的現實與發展所需，根據翻譯理論家劉宓慶的看法，文化翻譯可能牽涉到：(1) 意識形態與觀念價值：譯語文化均傾向接受與自身文化相合的表現模式。若該翻譯所呈現的文化表現無法融入譯語文化之中，譯語文本便難以被譯語文化接受或吸收。(2) 語言文化現實：不同時期的語言特徵，常有不同接受標準，諸如：詞彙、語法、語音等，因此翻譯須建立在語言歷史及其現實背景中。(3) 接受者接受度：接受者均有自身不同的文化歷史經驗，所謂超然、抽象的接受者是不存在的。(1999：259) 因此，從文化翻譯發展來看，由於翻譯必須考量譯語文化、歷史等面向，常觸及民族文化心理層面，包含民族思維與傳統風俗、習慣特徵等，在源語文本進行翻譯轉換時，此類文化社會因素應納入考量範圍。

文化翻譯是創造與轉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既定的語言視界會產生轉變。翻譯是一種「轉化的創造 (Transcreation)」，須經協商與重構源語與譯語語言、文化間既定的界線，是一種「越界—創造 (Trans-creation)」(劉宓慶，1993：59)。翻譯行爲帶來的雙語轉換若要視爲有效，須由社會因素加以應證與支持。社會因素的缺乏將導致翻譯淪爲無功效、無意義之活動。(劉宓慶，1993：80) 因此翻譯必須進入譯語社會中，並在某種程度下符合譯語社會的期待與規範。

由此可見，源語文本藉由翻譯行爲轉換譯語文本的過程，不單是語言上的替換，更重要的是，譯語文本(源語文本的轉換)須

考量譯語文化及譯語接受者的接受度，將源語中的文化、語言物件加以拆解與重組，並且依附在譯語文化的詮釋之下。就如同翻譯研究學者勒弗菲爾 (Lefevere, 1945~1996) 所指出，翻譯過程包括了文化混合 (Mixture)、文化適應 (Acculturation) 或文化歸化 (Naturalize) 等 (Lefevere, 1992: 127-128)，而譯語文本在譯語文化中被該文化接受者接受的過程亦包含這類混合、適應與歸化歷程。語言乘載其所存在的文化與歷史意涵，以此看來，翻譯不再是一場單純的語言交換行動，應在單純的字對字轉換之外增添文化面向之考量。

### 參、翻譯與殖民

在愛德華·薩依德提出的「東方主義」論述中所指涉的「東方」(The Orient) 乃自歐洲 / 西方的觀點與認定而來，視東方主義為「一種西方對東方的投射，也是一種西方想治理東方的意圖」(Young, 周素鳳等譯, 2006:395)。並且是歐洲 / 西方觀點的再現 (Representation)。對於歐洲 / 西方來說，所謂的東方「幾乎就是歐洲的一項發明，而且自古以來便是一個充滿浪漫、異國情調、記憶和場景縈繞、令人驚艷的地方。」(德華·薩依德, 王志弘譯, 2005: 1) 它被西方所管理並生產，成為東方的代理人。西方自認為知識與權力的核心，因而創造出西方觀點下的「東方」，並且在某種意義層面上刪去他們亦身為人的事實。身為西方帝國主義權力者，對於所謂「東方」的興趣源自於殖民與被殖民的密切關連，並且關於「東方」學術知識，都與政治行為有所牽扯。在政治的侵犯之下，東方人文知識受到忽略或否認，彷彿東方所呈現出的生活真實並不存在，並且絲毫起不

了作用。由西方再現的「東方」是一種殖民者心態描述，光是憑著想像就可以輕易佔領與建構。

文化翻譯的觀點是，翻譯係為一對源語文本的拆解、轉造與重組過程，並且須依附在譯語文化之中。藉由翻譯行為將原依附在源語文化之下的源語文本，進行轉換或改造，使之進入譯語文化中。此一轉換過程非僅是語言上的單詞對換，須考量文化及語言差異下帶來的不可譯性限度以及譯語文化（接受者）的接受度。若不經此過程，譯語文本便無法在譯語文化中生存下來。因此，若將薩依德的論點與文化翻譯理論觀兩造對應，翻譯似乎可看作是一場殖民行動。它侵入原依附在源語文化中的源語文本，以譯語文化觀點重新詮釋，並產生新的意義內涵。譯語文化成為譯語文本的一種界定，對照薩依德的「西方—東方」概念論述，譯語文化似乎可看作是藉譯語文本管理並生產「譯語接受者心中的源語文化」概念，就如同東方主義中的「東方」是西方眼中的產物一樣；而依附譯語文化下的譯語文本進一步成為源語文本或源語文化的代理人。

在此權力、支配觀點之下，薩依德提出的「西方—東方」觀點亦闡述了「源語文化中的源語文本—譯語文化中的譯語文本」之間的關係——那是一套程度多變的複雜霸權 (Hegemony)，而所謂的霸權，正是文化上的領導統御 (Cultural Leadership)。薩依德將東方主義定義為一種思考風格，立基於「西方」與「東方」之間，因此在界定「西方」與「東方」的本質化差異時，以「東方」做為「西方」界線/界限。(張君玫，2012：110) 以此看來，「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之間，亦存在了某種以譯語文化作為領導統御的可能性，並且在討論或翻譯時是以「源語文化」做為「譯語文化」界線/界限。

此外，後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1949~) 在其

相關後殖民論述中提出「在非自願的『後殖民境遇』(Postcolonial Situation)中，『非西方』知識分子往往必須進行一種創造混種文化的自願過程。殖民者的權威因此不再是顯而易見的，而被置入一個文化翻譯的空間，成爲一個『換置與失所的鍊結』(an articulation of displacement and dislocation) (Bhabha 1994: 114-116)」(張君玖，2012：44) 霍米巴巴在對於文化翻譯的觀點中提出了「第三空間」概念，他認爲文化差異存在於無法對譯的空間中，並且使翻譯過程產生裂隙，開啓了潛在性的談判空間，即所謂「第三空間」。由此可知，第三空間係指在翻譯過程中因文化差異而建構出一個矛盾、混雜的空間。霍米巴巴指出，人類群體是由文化差異 (Culture Difference) 和混雜性 (Hybridity) 所建構出的，若意識到這點，就不會將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直接以二元方式劃分。第三空間的存在使得殖民者外的他者得以現身，霍米巴巴贊同讓文化差異存在於此一混雜的空間之內，因此第三空間調停了兩種不同文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相互滲透。(Rutherford, 1990：211-220)

在第三空間中的一切協商、妥協與拉扯都成了被殖民發聲的一種可能。源語、譯語以及雙方文化在翻譯過程中的相遇與碰撞，同樣進入了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間，二者在這之間進行語言和文化的轉換與磋商。第三空間內的調停過程一旦結束，即源語文本轉換成譯語文本進入譯語文化中，就不得不成爲依附在譯語文化殖民之下的被殖民者，並且無法脫離譯語文化存在。

依照薩依德提出的東方主義、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間論述以及文化翻譯理論觀點，翻譯行動與殖民行爲之關係可以下圖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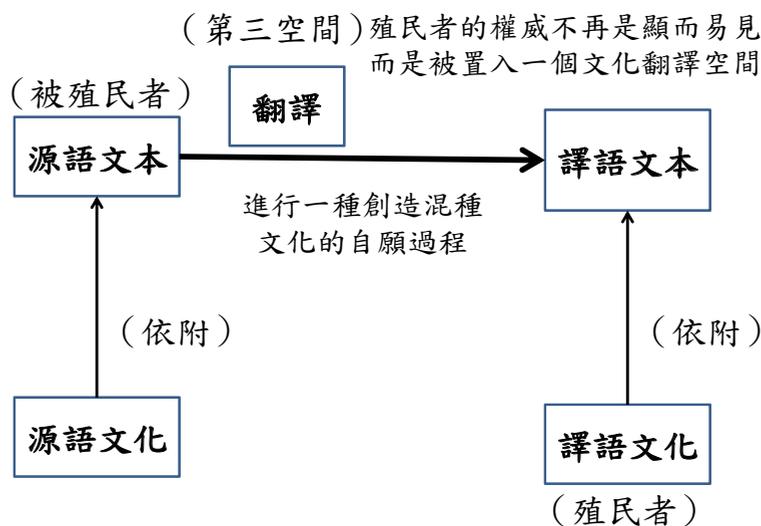


圖 1 筆者自繪：以東方主義、第三空間以及文化翻譯觀點，闡述翻譯行動與殖民行為之關係圖

根據上圖，翻譯係指殖民者 / 譯語文化與被殖民者 / 源語文本被置入文化翻譯空間（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間）中，進行混種文化的創造，殖民者 / 源語文本的權威不再是顯而易見，而是被置入一個文化翻譯空間。翻譯完成後，產生的混種文化，即由源語文本轉換的譯語文本，若無法被該文化與接受者接受，該譯語文本可能被替換、遺忘或以其他譯本再出版，以進入譯語文化之中，直到該文本真正被譯語文化接受固定下來或被完全剔除。譯語文本亦可能被以全盤異化或歸化的方式被引介至譯語文化中，此時對於混種文化的看法就出現了新的可能，關於異化與歸化翻譯策略的論述將在下一章節中提出討論。

以德語青少年翻譯文學中，書名多次以不同翻譯名稱在台

出版的德語作家麥克·安迪 (Michael Ende, 1929~1995) 筆下的故事 Momo 為例，台灣較為常見的有：《默默》<sup>1</sup>、《茱茱》<sup>2</sup> 以及《夢夢》<sup>3</sup> 三種不同翻譯版本。其中，源語文本內提到德國大眾運輸工具 “Stra enbahn”<sup>4</sup>，由於進行文本翻譯當時，台灣並沒有相同或類似的運輸系統，因而翻譯結果並未受到譯語文化所接受，“Stra enbahn” 的中譯方式於翻譯中一再改變，例如李瑟花版譯語文本《夢夢》和鄭皮耶版譯語文本《茱茱》均將 “Stra enbahn” 省略不譯，李常傳版譯語文本則以「電車」一詞譯之；另外台灣對於 “Stra enbahn” 的翻譯常見的還有「街車」、「路面電車」、「輕軌電車」、「有軌電車」等，這些譯法意思雖然相近，但對於九〇年代還沒有類似大眾運輸工具的台灣讀者而言，此一譯法無法被完全接納並固定下來。

另外，若源語文本本身就是作者自創的詞彙，這類翻譯也較難被定型或接納，因為這種根本不存在或當前不存在的詞彙意涵，在語言轉換時定會觸及可譯性問題，自創詞彙可能是依據源語特性或源語文化獨有概念所創造延伸出來的，也可能僅是作者的憑空想像，因此對於譯語文化和譯語接受者來說自創詞彙較不易被想像，進而影響了接受程度。例如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無稽詩人愛德華·李爾 (Edward Lear, 1812~1888) 的著名詩作 ‘The Owl and the Pussycat’ (貓頭鷹和小貓) 詩中提到了一棵 “Bong-Tree”，這是作者將英語原有詞

<sup>1</sup> Michael Ende 著，李常傳譯，《默默》(台北：遊目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sup>2</sup> Michael Ende 著，鄭皮耶譯，《茱茱》(台北：龍和出版有限公司，1991)。

<sup>3</sup> Michael Ende 著，李瑟花譯，《夢夢》(台北：世茂出版社，1993)。

<sup>4</sup> 根據 Duden 德語字典的解釋「Stra enbahn」指的是「以軌道連結且以電力推動的市內大眾運輸系統」。

彙“bong”（鑼、大鐘等發出的響聲）與“tree”（樹）作結合而產生的新詞。翻譯時便產生因無法想像或無對應詞彙而導致譯語暫時無法被固定或接納的結果。關於“Bong-Tree”的中文翻譯眾多，常見的即有藉意義產生概念的：銅鑼樹、鐘鳴樹等譯法；及以音譯傳達的：噹噹樹、棒棒樹、蹦蹦樹、邦邦樹等數種譯法。

由此可見，若譯語文本無法被譯語文化所接受而保存下來，那麼關於翻譯被用以作爲霸權統治工具的可行性與可利性便縮減了。而就翻譯作爲殖民行動的觀點看來，上述二例均無法以譯語文化作爲譯語文本的界定，無法稱作是譯語文化的再現，以致於譯語文本無法被譯語文化所使，並被全整的保存、接納至譯語文化之中。

## 肆、後殖民論述中常見的翻譯策略

### 一、異化

在討論後殖民翻譯時，異化 (Foreignization, Alienation) 是經常被提出的翻譯策略。異化概念爲「忠實於源語文本，保存異域情趣，更多地保留語言文化的民族性」（金惠康，2002：358）透過此一翻譯策略可將源語文化及源語中的特性直接傳達給譯語文化接受者。因此「異化」翻譯策略常與「霸權」或「文化霸權」此類概念相連。就異化翻譯策略的缺點來看，它可能使得譯語文本生澀難讀，當文本觸及譯語與源語文化或語言差異時，譯語文本便難以讓譯語接受者瞭解或感同身受，這將導致譯語文本無法順利地依附在譯語文化之下，因此容易被遺忘或淘汰。

此外，這類翻譯策略被賦予了一項重要意義，即「幫助譯語文化創造出新的詞彙或句法」。此種新詞彙、新語句的創生，亦須依賴譯語文化的接受度，否則就只能存在譯語文本之中。譯語接受者在對面異化翻譯所產生的新詞彙或新語句時，並非每次都能立即產生認同或共鳴，須時間適應或認識。

以台灣繪本作家陳致元的作品《Guji Guji》一書為例，該書被翻譯成許多不同語言，由於故事主角 Guji Guji 是隻誤長在鴨子家庭並長期自以為是隻鴨子的鱷魚，在譯入德語時譯者將德語“Ente”（鴨子）與“Krokodil”（鱷魚）二字組合，為 Guji Guji 這隻鱷魚鴨創造新詞，各取“Ente”與“Krokodil”二字之首尾，譯作“Entodil”。雖然譯語文本為源語文本做了改變，此一字彙卻未被譯語文化全盤接納而成為正式新詞，譯者採取的異化翻譯方式目前僅讓這隻“Entodil”活在德語版的 Gui Gui 一書及其所建立起的接受者群中。<sup>5</sup>

另一個異化翻譯的例子是美國作家畢約翰 (John Bibe) ，其以青少年為書寫對象並以其為主角的喻道故事 The Magic Bicycle，在引介至台灣時該書以漫畫形式改編，中文書名採音譯結合意譯策略，譯作《魔幻拜斯高》，「拜斯高」係英語“bicycle”之音譯。對於台灣的青少年接受者來說“bicycle”（腳踏車），不但是生活中常見的交通工具，即便直接讓這群青少讀者面對源語“bicycle”一字，也不至於太過陌生。<sup>6</sup> 因此這樣的翻譯方式即便產生了魔法般的虛幻，讓這輛腳踏車變成不存在於真實的想像，卻也造成接受者的混淆與困惑，「拜斯高」一詞也並未因此在譯語文化中被保留下來或導致譯語文

<sup>5</sup> 《Guji Guji》一書譯作德語後，因德語發音關係將書名改為 Gui Gui。

<sup>6</sup> 「bicycle」一字係屬教育部於 92 年 1 月公布之「國民中小學英語基本字彙」中的「基本 1000 字彙」。

化產生語言變化。

並非所有異化翻譯結果都無法被譯語文化接納，例如在《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書系中的“Muggle”一詞，泛指沒有魔法能力的一般人，譯者將“Muggle”直接以「麻瓜」音譯之。單看「麻瓜」一詞，譯語接受者雖無法從自身文化或先備知識中直接產生相對概念，但此一不存在既定譯語文化中的新詞，藉異化翻譯策略被引入譯語文化中，並隨著《哈利波特》系列電影與書在台灣的高能見度與高暢銷度而被廣爲接受。「麻瓜」一詞甚至在台灣的媒體報章雜誌中直接被提出使用。同樣情形也出現在托爾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 1892~1973)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 書中角色：「咕嚕」(Gollum)，譯者雖採異化音譯方式，但因該角色在《魔戒》電影中的形象鮮明，「咕嚕」角色被譯語文化接受者所接納，在媒體或一般對話中常借以指稱長相怪異或醜陋的之人。<sup>7</sup>

不可否認地，現代中文無論在語法、詞彙上都已經相當程度地受到異化影響。劉宓慶對此指出，「文化的滲透是相互的，是由人類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推動的。因此，任何一個民族文化拒絕外域文化的滲透是不可能的。這也是大勢所趨。」(劉宓慶，1993：293-294) 例如，爲了像英、美語中的名詞表明複數形式，中文的「們」字因此被廣泛並千篇一律地使用，進而忽略了中文中其他豐富多變的複數名詞表達方式，例如，「諸」位、「各位」先生、「列」祖、「群」醫、吾「等」、吾「輩」等。當然中文也出現了外語詞彙匯入情形，即先以異化方式引介至台灣，當該詞彙、語法被台灣的文

<sup>7</sup> 咕嚕，原名史麥戈(Sméagol)，乃英國作家托爾金小說中之虛構角色。在其1937年出版之著作《哈比人歷險記》(The Hobbit) 中首次出現，並在托爾金的續作《魔戒》中擔任要角色。

化與接受者接納後，進而進行歸化接收的過程，例如“sofa”譯作「沙發」、「typhoon”譯作「颱風」、「show”譯作「秀」等音譯詞；另外音譯結合意譯的例子則有：“motorcycle”，取其“motor-”之音，譯作「摩托」，再依其義，譯作「摩托車」等例。

## 二、歸化

歸化 (Domestication, Adaptation) 是與異化相對立的一種翻譯方式，此一翻譯手法是將源語文化中的詞彙以「本土化」的方式引至譯語文化中。亦即使用譯語文化中慣用的表達方式，或相對應的詞彙、概念來轉換源語。(金惠康，2002：355) 這是一種藉由歸化行為將源語納入譯語文化的翻譯方式，使譯語接受者在閱讀時更感親切，但此種方式較不易達到文化傳遞與交流。例如在洪素珊 (Susanne Hornfeck) 所著的《銀娜的旅程》(Ina aus China) 一書中，譯者將德語源語文本中所提到的德國食物“Sandkuchen”<sup>8</sup> 直接採歸化方式以台灣常見的點心「雞蛋糕」譯之。雖然譯語接受者在閱讀時能直接對「雞蛋糕」一詞產生相對應意象，進而對於食物的口感、味道、香氣產生連結，但譯語接受者卻無法藉此認識或瞭解源語文本所指稱的真實物件，因而產生某層面上的誤解。

另一個例子是，在《銀娜的旅程》中，作者洪素珊為將中華文化中的「千里眼」與「順風耳」二者介紹至德語文化中，便以德語「Tausend Meilen Auge」(千—英里—眼睛) 與「Tausend Meilen Ohr」(千—英里—耳朵) 譯之。此譯法係依德語文學中的

<sup>8</sup> Sandkuche：以蛋、麵粉、糖、油等食材製成，其外型和利用濕沙所捏塑出來的沙丘形狀相似而得名，德語中的 Sand 就是指「沙」、「沙丘」。

Siebenmeilenstiefel 一文而來，該文描寫了一雙具有魔法的靴子 (Stiefel)，凡穿上這雙靴子的人就能立即到達七英里 (sieben Meilen) 遠之處。<sup>9</sup> 作者以相似該作之概念，將「千里眼」以歸化方式譯作「Tausend Meilen Auge」；亦將「順風耳」譯作「Tausend Meilen Ohr」，對德語讀者而言，藉由此一翻譯方式可快速瞭解並產生意義，但卻無法體會「順風耳」一詞中涵蓋「能夠聽到隨風而來之聲音」此一意涵。

歸化翻譯策略常應用在動畫電影或卡通翻譯中，譯者利用相對應的譯語文化抽象或具體物件、事件或概念將源語文本進行「本土化」改造，爲引發譯語接受者（觀眾）的共鳴，進而產生或達到趣味性，這也是部分動畫電影和卡通一較爲清楚、常見的功能——引發趣味。例如，在台灣上映，由導演拉加 高斯內爾 (Raja Gosnell) 改編自比利時漫畫家沛優 (Peyo, 1928-1992) 及其夫人共同創作的漫畫《藍色小精靈》(The Smurfs) 電影中，當藍色小精靈們誤闖入人類世界而感到震驚與不可思議時，其中一隻藍色小精靈驚訝地喊出：“Oh, my smurf!” 與此句較爲接近的意涵爲：「我的天啊！」但此處譯者爲達到貫穿此部電影的趣味性，不僅改變原意、更採以歸化翻譯策略，以中文文字、台語發音的譯語文化常用語進行翻譯，譯作「“藍”底叨位？」；另外，當藍色小精靈表達「一點都不錯」(exactly) 時，依照所屬群體之語言並混雜英語，說出：“Smurf-xactly!”，譯者以台灣常見的錯誤發音方式，配合藍色小精靈身體顏色特性，譯作「不“藍”咧！」，引發譯語接受者（觀眾）的文化、語言共感，進而產生趣味性。

歸化翻譯策略改變了源語文化的文化思維，爲使譯語文本無所

<sup>9</sup> 參自：Wikipedia, der freien Enzyklopädie- Siebenmeilenstiefel <http://de.wikipedia.org/wiki/Siebenmeilenstiefel>，下載日期：2013/11/20

阻攔地進入譯語文化之中，被譯語接受者所接受。更確切的來說，歸化翻譯刪去了源語文化特性並將譯語文化思維加諸於源語文本及源語文化之上，使得譯語文本無法傳遞源語文化的真實樣貌。此一強加改造行爲，猶如一場侵佔攻略，讓源語文化無法在譯語文化中被認識與保存。依此翻譯策略，譯語文本不再是源語文化的代言人，它脫離了原本的軌道，進入一個全新的再創造之中。並且去除所有文化、語言異質性，跨越文化、語言間差異產生的不可譯性界線，依循另一個不同於源語文化的文化模式，產生全新的再生文本。

## 伍、翻譯策略的選擇

在談論後殖民與翻譯的眾多論述中，異化與歸化是最常被提出來討論的兩種翻譯策略，由其是異化翻譯策略常被用以指稱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一種強行加附、改造文化的行爲。但若細究異化與歸化兩種不同的翻譯策略，歸化翻譯實則比異化翻譯更像是場殖民行動，因爲它將「源語文本 / 被殖民者」借用「歸化 / 西化」殖民方式納入「譯語文化 / 殖民者」中，這種強勢的文化改造與覆蓋，甚至轉變了源語文本的原始樣貌與意涵。

以譯語文本傳述源語文本總會產生偏頗，並傳遞出譯語的某些特質。事實上惟有當源語文本能在鮮明的譯語文化本土形式中獲得理解，才能達到交流的可能性。因此，翻譯是一段不可避免的歸化過程。翻譯過程中，源語文本被標上能使譯語文化特定群體易於瞭解的語言和文化價值印記，此一標記的過程貫徹了翻譯的生產、流通及接受的每一環節。(許寶強、袁偉編選，2000：359)

此外，林語堂認爲異化翻譯「直譯源語句法」，亦將源語文化的語法與思考邏輯直譯到譯語文化中，此法等同直譯源語文化思維改造譯語文化思維。他主張，譯語文本必須經過一定程度的本土化，亦即遵循譯語文化思維，唯有藉由通順的語文才能對源語文本的意涵進行適切的傳達與翻譯，否則譯語文本就不算是有意義的話語了，只是非譯語的譯語。他認爲，在翻譯過程中歐化是必然的，但只侷限在詞彙，不應影響或改變譯語語法。（張君玫，2012：133）林語堂提出的「國化」概念其實就是翻譯策略中的「歸化」手法，他認爲譯語文本的「語法」須根據譯語語法，不應以源語語法爲依歸。

整體而言，無論譯語文化中的語法或詞彙是否受歐化影響、無論是有否意識地被歐化，都必須以「譯語文本先被譯語文化接受」爲前提，爾後才有歐化產生的可能性。換句話說，譯語文本若不被譯語接受者或譯語文化所接受，若不經過翻譯／殖民方式進入譯語文化中並依附其上存在，未經此一歷程，無論採用何種翻譯策略都無法讓「西洋心理」對譯語接受者加以改造，即文化翻譯中所探討的接受者因素 (the Factor of the Receptor)。在這之中，源語文本文本被看作是靜態、個體的，而接受者（譯語接受者／譯語文化）則是能動、可變、群體的。由此可見，接受者因素是翻譯中的重要考量機制：有意義的翻譯活動不可能是孤立、個體的，必然是社會性、群體的。（劉宓慶，1993：81）而爲考量譯語接受者的接受度，使得源語文本進入譯語文本時必須有所改變，以符合譯語接受者的期待與接納程度。更進一步的來說，在「西洋心理」或源語文化改造譯語接受者或譯語文化之先，譯者就已經藉由像是殖民一般的翻譯行爲先行改造了譯語接受者眼中的「西洋」與源語文化。

## 陸、結語

所謂「後殖民情境」即「百家辯駁爭鳴，競相解釋或描述存在於不同民族、不同種族和不同語言之間的不對稱和不平等的關係」（許寶強、袁偉編選，2000：117），這種關係正為翻譯行為下了很好的註腳。向來被定位為「為不同話語所遣，以為延續和保持殖民統治之用」的翻譯行為，在殖民相關的論述中一直扮演著協助殖民文化定型之要角。自歐洲啟蒙運動起，翻譯一直被用來支撐著種種主體化的闡述，對被殖民民族而言更是如此。（許寶強、袁偉編選，2000：120）

翻譯彷彿成為殖民者的一種利器，用以定型、延續、保持殖民與被殖民者的關係。它被論述為一種霸權的強化，<sup>10</sup>但更深一層的來看，翻譯在語言、文化的轉化歷程中，同時也表述了一場殖民行動：譯者與譯語文化強行進入源語文本中進行改造，並要求轉換後的結果是：譯語文本須適應譯語文化。並使譯語接受者按照轉換後的譯語文本建構出心中的「源語文化」以接受者所處的文化自身視角出發，「源語文化」成為譯語文化的一種再現。

譯語文本乘載了許多在翻譯過程中，從源語與譯語文化雙方取得的文化意涵，雜揉了兩文化間的建構物。譯語文本不可能也不能夠單僅採用源語文本的文字概念，因為在「採用」的過程中，就已經涉及翻譯與轉化過程，它必須取得新的文化意涵，諸如意義改變、減損、增添等，並進入譯語文化中。此一文化語言雜揉或交涉過程，

<sup>10</sup> 相關論述可參見，曾巧雲，〈從譯腦到殖民地經驗的再翻譯〉，《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2期（2011.04）。

或稱作翻譯，就進入到霍米巴巴所指出的第三空間，而此一交界面的提出打破了殖民與被殖民的二元對立，雙方出現了對話的可能性。使得身爲被殖民角色的源語文化下的源語文本在轉換進入譯語文化之前，出現了磋商的可能。

薩依德東方主義中的「西方—東方」界定、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間」以及文化翻譯的翻譯考量因素與翻譯過程，三者共同陳述了一場以翻譯爲名的殖民行動。譯語文本看似代表卻又遠離了源語文化，譯語文本對譯語文化的意義甚至大過了源語文化本質，並且此意義是來自於譯語文本（由譯者及譯語文化主導）試圖對源語文本的各種再現，此一再現極可能是身爲譯語文化一環的譯者，基於從先前其他譯者、譯語文本而來，並以此產生對源語文化認知的建構，因此翻譯構塑了一種殖民狀態下不對稱的權力關係。

根據薩依德的看法，以「東方」作爲「西方」相對照的意象、理念、人格與經驗，某方面來說幫助了「西方」對自我的界定。(Said, 王志弘譯, 1999: 2) 但「東方」並非只是被動存在的自然地理，無論是西方或是東方，人們創造了屬於他們自身的歷史。而每一位書寫東方的人，都應該將自己與東方的關係做好定位而後轉介入文本。(Said, 王志弘譯, 1999: 27) 同樣地，對於譯語文化及譯語接受者來說，源語文本和源語文化不應該只是「僅存在那兒 (mere-being)」的語言和文化概念而已。它們乃是擁有其自身文化內涵的真實存在。

因此身爲執行這場殖民行動的譯者，應將自己與源語和譯語文化、語言的關係做好定位，爾後進行翻譯。因爲無論譯語文本以何種方式呈現：混種文化、全盤異化或歸化，均仍須仰賴譯語文化生存。而翻譯過程本身不僅是一場對源語文本的殖民行動，它也同時創造了一個可以讓源語和譯語文化、語言進行對談的「第三空間」，殖

民與對話在翻譯中同時進行，讓譯語文化自身以外的他者有可能發聲的機會，不再用二元對立模式來看待源語、選擇譯語。總體而論，譯者在預設立場與先備知識的催使之下，所採納的翻譯策略以及所選擇對應的譯語詞彙，都可能成爲一個可被分析的形構，也影響了兩個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譯語文本的被接受程度，同時也參與、協助譯語文化對源語文化的再建構與認知。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部分

#### (一) 專書

- 生安鋒，《霍米巴巴》（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01）。
- 張志鈞，《魯迅的歐化文字——中文歐化的省思》（台北：師大書苑，2005.05）。
- 金惠康，《跨文化交際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09）。
- 張君玖，《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慾望》（台北：群學出版，2012.03）。
- 陳定安編著，《翻譯精要》（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7）。
- 許寶強、袁偉編選，《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01）。
-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02）。
- 劉宓慶，《當代翻譯理論》（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09）。
- 劉宓慶，《文化翻譯論綱》（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1）。
- Said, Edward / 愛德華·薩依德，王志弘譯，《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台北：立緒文化，2005.10）。
- Vygotsky, Lev Semyonovich / 列夫·謝苗諾維奇·維果茨基，李維譯，《思維與語言》(Thought and Language)（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9.1)。

Young, Robert J. C./ 楊恩, 周素鳳等譯, 《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引導》(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台北: 巨流, 2006.01)。

## (二) 論文

### 1. 期刊論文

曾巧雲, 〈從譯腦到殖民地經驗的再翻譯〉,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2期(2011.04)

### 2. 學位論文

吳肇祈, 〈翻譯之可譯性探討—以《銀娜的旅程》一書為例〉,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德語研究所論文, 2000.07)。

## (三) 舉例文本

陳致元, 《Guji Guji》(台北: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05.02)。

Bibee, John/ 畢約翰, 李志明改編, 《魔幻拜斯高(上)(下)》(The Magic Bicycle)(台北: 校園書房, 1999.02)。

Ende, Michael / 麥克安迪, 李瑟花譯, 《夢夢》(Momo)(台北: 世茂出版社, 1993)。

Ende, Michael / 麥克安迪, 鄭皮耶譯, 《茱茱》(Momo)(台北: 龍和出版有限公司, 1991)。

Ende, Michael / 麥克安迪, 李常傳譯, 《默默》(Momo)(台北: 遊目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6.03)。

Hornfeck, Susanne / 洪素珊, 馬佑真譯, 《銀娜的旅程》(Ina aus China)(台北: 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0.03)。

Lear, Edwar / 愛德華·利爾，楊曉波譯，《荒誕書全集》（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2011.05）。

Rowling, J. K. / J.K 羅琳，彭倩文譯，《哈利波特(1): 神祕的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 (台北：皇冠出版，2000.06)。

Tolkien, J. R. R. / 托爾金，朱學恆譯，《魔戒首部曲：魔戒現身》(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12)。

## 二、西文部分

### (一) 專書

Bhabha, Homi (200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Lefevere, Andre (1992):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Rutherford, Jonathan (1990): The Third Space. Interview with Homi Bhabha. In: Ders. (Hg):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207-221.

Waugh, Patricia (2006):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An Oxford Gui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 (二) 舉例文本

Bibee, John (1983): The Magic Bicycle. Downers Grove: IVP Books.

Chamisso, Adelbert (2003): 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 Chen Jianghong (2013): *Gui-Gui*. Das kleine Entodil. Basel: Beltz & Gelberg.
- Ende, Michael (1973): *Momo*. Stuttgart: Thienemanns (K.) Verlag.
- Hornfeck, Susanne (2007): *Ina aus China oder Was hat schon Platz in einem Koffer*.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Co. KG.
- Lear, Edward (2002): *The Complete Verse and Other Nonsense*. New Jersey: Penguin USA.
- Rowling, J. K. (1998): *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 New York: Scholastic.
- Tolkien, J. R. R. (2001): *Lord of the Rings (Part I):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

### (三) 視聽媒體資料

- Jordan Kerner (Producer), Raja Gosnell (Director). (2011). *The Smurfs* [Motion picture]. USA: Sony Pictures Animation